生存为大:大学生猪倌何以可能?

王　惠　韦陆星　吴惠芳

[摘　要]文章关注寒门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就业问题,以山东省大道养殖场的大学生猪倌为例,探究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依然从事父辈赖以生存的第一产业的原因及其能否实现自我认同。文章沿着再生产议题、身份认同两条分析路径回到主体本身,从大学生猪倌的洞察和认知中寻找答案。研究发现,大学生猪倌基于"生存为大"的现实考量选择成为猪倌。一方面,其选择从事生猪养殖业受到"结构—家庭—个体"视角下"生存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职业—学历—情感"三重身份都陷入自我认同与自我怀疑的两难困境。即使遭遇身份困境,迫于生存压力,他们也依然选择成为猪倌。猪倌现象不仅关涉农村大学生的高质量就业问题,而且也与社会稳定、社会再生产以及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生存文化;自我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寒门贵子"指的是出身贫寒,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学子。"寒门能否出贵子"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然而,这一议题的核心是寒门子弟的高等教育问题,忽视了寒门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要面临更复杂和严峻的就业挑战。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2011—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显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且同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明显比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低10%以上(谢倩芸,2023),这一数据透露出农村籍大学生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

由本研究调研数据可知:山东省德州市李村大道养殖场的一线生产岗和管理岗的猪倌共有105人,其中94.2%的猪倌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且89.5%的猪倌是农村户籍(本文中关于养殖场和受访者的相关信息均已做匿名处理)。农村籍大学生已

[收稿日期] 2024-09-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产业链的社会学研究"(20BSH064);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遭遇技术:'数字猪倌'的劳动过程研究"(202325);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青年人才专项课题项目"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优化研究"(25YT012)。

[作者简介]王惠,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社会学、劳动社会学、青年研究;韦陆星,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共青团与青年工作;吴惠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社会学、性别与发展。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成为该地生猪养殖业的主力军。这一现象值得深思: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子弟从事了父辈赖以生存的农业产业,其选择在他乡农村从事农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能否在猪倌岗位上获得自我认同?

二、理论关照与现实讨论

(一)再生产议题:从社会再生产到文化生产

寒门子弟"子承父业"是一个历史性的经典议题,其根本关怀是再生产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议题的研究关注制度性、结构性要素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其中,最经典的是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观点,他们认为教育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产物,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工人,教育不平等的根本是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把控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一系列不平等就会持续存在(张人杰,2009:180-181),即学校成为一个"资本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的场所(吕鹏,2006)。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体制是"阶层间相对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并没有实现阶级流动,反而加剧了阶层固化,即子承父业(Bowles & Gintis,1976)。

进入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文化转向趋势,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盛行。他指出,教育制度是文化再生产的媒介,是社会上层阶级实现地位继承性传递的工具(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a:213),教育表面上是公平公正的制度,但是"社会出身完全确定了不同的机会,从生活条件到工作条件(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b:14)"。学生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同,拥有不同量的文化资本,形成了惯习,从而影响他们在后期教育中的表现。例如,精英子女更容易继承或培育文化资本,更具有文化天赋,进而保障了其在教育中的长期优势位置(朱国华,2015)。

威利斯(2013)肯定了布迪厄的贡献,但也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布迪厄的研究更关注宏观的文化结构,忽略了底层人们的主体行动。他创新了"文化生产"的概念,将人们在学校的行为概括为"反学校文化",强调其主体性与创造性,认为他们并不是一群任由社会制度、学校教育安排的被淘汰者,反而通过反学校文化自我放弃了可能的上升途径。另外,威利斯创新了"洞察"的分析方法,将行动者带回具体案例中,关注行动者的行为和想法,展现再生产的过程细节,将静态的因果或机制通过动态的具体过程呈现出来,打开了再生产的"黑箱"。

再生产议题的讨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思路,尤其威利斯的"文化生产"和"洞察"的分析方法,关注主体本身的行动和认知,在动态的具体事件中解释事情发生的因果机制。

(二)自我认同与社会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经典社会学家关注到人本身。不同于前现代传统秩序中的群体观念,"个体""自我"等术语成为描述现代性的重要元素,甚至有学者将现代性归纳为"自我"解放的过程(刘军宁、王焱,1998:45)。马克思的价值理想关注"现实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有生命的个人”。“人”和“人类”的概念就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那里取得本原依凭的(张文喜,2000)。马克思(1979:51)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划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他认为,个体的自我认同不仅需要自我意识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活动中建立社会关系,进而实现自我认同。吉登斯也敏锐地观察到现代社会中人的主观感受,认为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吉登斯,1998:275)。个人经历是与其他主体、制度等要素互动下的“关系性”自我。同样,在理解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时,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并不是孤立的自我认同,而是具有关系性的自我认同。

马克思和吉登斯的观点提醒我们在反思自我认同的议题时,不仅要关注个体本身,也要关注相关的社会关系。

(三)现实讨论:寒门能否出贵子

“寒门能否出贵子”是学界备受争议的热点议题(余秀兰,2014),核心研究视角是教育与社会流动。一方学者认可“教育对社会流动具有促进作用”,认为寒门仍可出贵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支持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历史(周勇,2017)。寒门家庭遵循“学业至上的保护主义”(王旭清,2021),通过“资本补给”与“自觉共情”的方式为子女提供教育支持(朱焱龙,2018)。底层子弟也会因为对家庭的负疚感,进而增加学习的决心和意志,产生努力回报父母的道德化思维(程猛、康永久,2016),通过高等教育逐步缩小与其他普通大学生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许多多,2017)。另一方学者认为,寒门再难出贵子。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胡勇,2018),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帕特南(2017)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社会阶层流动不通畅、结构形态固化、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是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困境(应中元,2020)。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网络热词共同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寒门子弟虽然获得了一流大学的入场券,但教育阶段之后的社会流动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王郢、宋洲,2024)。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虽能拓展寒门子弟的就业资本,但效果有限,就业资本存量匮乏、资本动员能力不足及就业心理负担大等是影响其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孙晓雨、王小璐,2023)。同时,寒门子弟的择业还易受家本位的传统观念影响,比起“考研”“考公”“考编”以获得更稳定、向上流动的机会,多数寒门子弟会先参加工作缓解生活压力(王胜威,2023),并选择收入较高或较为稳定的就业机会,在经济、时间上回报家庭(郑雅君,2021)。

综上所述,寒门能否出贵子的讨论集中在寒门能否出贵子以及如何出贵子等方面,但对于寒门子弟完成高等教育后的就业选择和发展困境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剖析。寒门子弟的就业问题不仅触及农村大学生的个体职业路径的抉择,更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再生产议题和身份认同的讨论为解释“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农村大学生还是选择了养猪这一父辈赖以生存的第一产业?他们能否在猪倌岗位上获得自我认同?”提供了理论思路。马克思和吉登斯的观点提醒研究者在反思自我认同时,不仅要关注个体本身,也要关注与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因此,回应“大学生猪倌何以可能”的核心是回到主体本身,即回到大学生猪倌本身及其社会关系中。本研究一方面从大学生猪倌的洞察和认知中考察其选择从事生猪养殖行业的原因,另一方面考察面对不同身份关系,大学生猪倌在生猪养殖业中如何自洽和寻找自我认同。

三、研究方法与田野点介绍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自2022年10月起,笔者陆续接触猪倌群体,经验资料来源于2023年2月至3月在山东省德州市李村大道养殖场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研。研究对象包括从事一线养殖工作的猪倌以及从事管理岗位的猪倌,同时还调研了猪场的后勤、人事、财务等相关工作人员。共访谈61人,其中男性41人,女性20人;农村户籍56人,城市户籍5人;实习生10人,正式工51人;专科以下学历11人,专科学历22人,本科学历24人,硕士学历4人(本文中出现的受访者信息见表1)。整理访谈资料二十余万字。调研期间,与猪倌同吃同住同劳动,旨在通过深入农村大学生猪倌的工作和生活,探索其从事养殖产业的原因,以及他们工作后是否实现了自我认同。

表1　文中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表

编码	性别	年龄	学历	籍贯	岗位
F1	男	22岁	本科	山东	技术员
F2	女	37岁	专科	山东	技术员
F3	男	21岁	专科	山西	技术员
F4	男	22岁	专科	山西	技术员
F5	女	23岁	专科	四川	技术员
F6	男	25岁	本科	山东	技术员
F7	男	21岁	专科	山东	技术员
F8	男	25岁	本科	山东	技术员
F9	男	28岁	本科	山东	场长
F10	女	24岁	专科	山东	技术员
F11	女	24岁	专科	山东	技术员
F12	男	19岁	高职	山东	技术员
F13	女	22岁	本科	辽宁	技术员
F14	女	25岁	本科	黑龙江	车间主任
F15	男	28岁	本科	山东	车间主任
F16	男	21岁	专科	山东	技术员

大道养殖场是集种猪生产、后备母猪育成、商品猪育肥一体的规模化畜牧公司,位于山东省德州市李村,在鲁冀两省交界处,属于华北平原,地势平坦。该地属于暖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温度适宜，年平均气温12.3℃，但多为盐碱地，粮食种植收益低，适宜发展养殖业，因此受到养殖公司的青睐。目前，德州市共有363家生猪养殖场（户）入选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位列全省第一。

大道养殖场是现代化数字养殖场，不同于传统养殖模式，大道养殖场配备了多种智能设备，比如环控系统、温控系统、智能饲喂等设备，实现了数智化养殖。大道养殖场共有4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有4个车间，分别是配怀、分娩、保育/育成、后备车间，每条生产线配备了1位场长、每个车间配备了1位车间主任和若干位技术员。

猪倌是养殖场有序运转的人力资源基础。不同于传统农业雇工老龄化、女性化的特点，数字养殖场的猪倌呈现出年轻大学生多和农村户籍多等新特征。大道养殖场共有员工125名，平均年龄27岁，呈现年轻化的特点。大道养殖场有三类岗位，分别是生产、后勤和管理岗位，其中生产岗位是一线猪倌，共有105人，平均年龄26岁；管理岗位是场长、车间主任等生产管理猪倌，共有13人，平均年龄28岁；后勤岗位是后厨、人事、办公室、财务等人员，是非猪倌员工，共有20人，平均年龄34岁。由此可见，第一，大道养殖场的猪倌整体较为年轻，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特别是一线猪倌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是三个岗位中最年轻的群体，即便是管理岗位的猪倌平均年龄也远低于后勤岗位的非猪倌员工。第二，猪倌大多数是专科及以上的大学生。一线猪倌只有6人是专科以下学历，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一线猪倌达到94.29%，管理岗的猪倌全部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由此可见，猪倌群体不仅趋向年轻化，而且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第三，猪倌多是农村户籍。大道养殖场农村户籍员工110人，占总员工数的88.0%。一线生产和管理岗的猪倌中，89.5%的人是农村户籍。

从养殖场中年轻大学生和农村户籍猪倌的分布比例可以发现，农村大学生猪倌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寒门子弟职业选择的议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选择了父辈赖以生存的第一产业，出现子承父业。

四、“结构—家庭—个体”视角下生存文化主导的职业选择

农村大学生选择从事养殖业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包括宏观的结构性因素、中观的家庭因素以及微观的个体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结构—家庭—个体”视角的分析框架解析农村大学生对猪倌职业的洞察。

（一）结构性推拉作用：城乡脱嵌的推力，产业振兴的拉力

1.城乡脱嵌的推力：融不进的城，回不去的乡

在城市读书期间，农村大学生感受到城市的繁华并被吸引留在城市工作。但是，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加班体验，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充足的休闲娱乐时间和机会。离开学校后，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感逐渐显现。“在大城市生活，消费太高了。上下班都得打车，如果挤地铁，一天通勤都需要两三个小时，还得租房子。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没有意义。”（F1）“之前的工作根本停不下来，加班是常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态,在城里那几年没攒下钱,倒留下了一身病。”(F2)受访者F3在山东牧校上学,目前在大道养殖场实习,他解释:“其实,我们场里大多数人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真的没有很多出路。像我们专业也有城里人,城里人学这个专业一开始是喜欢小动物,他们都去干宠物医生了。我们不行,宠物医生工资太低了。这一行说出去真的不好听,技术员是好听的叫法,说白了还不就是一个养猪的!……干这个行业,谁也没想伟大,都是想要挣点钱。”可见,农村大学生在攻读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等相关专业后,相较于在城市从事宠物医生的光鲜职业,他们更倾向于投身于收入更为丰厚的职业。

由于乡村就业岗位有限、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支持不足等原因,家乡成为他们“回不去的乡”。第一,乡村缺少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缺乏创业支持,农村大学生返乡陷入了生计困境。“我不是没想过回村,但是回去没有合适的岗位。如果回乡创业,家里供我上学已经不容易了,根本拿不出创业的本钱。”(F4)第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城乡差距大。上学期间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村大学生陷入回归乡村工作生活的困境。此外,传统乡土文化排斥大学生返乡就业。在农村熟人社会中普遍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就业没出息”的传统观念。农村大学生怯于被贴上“没本事”“不成功”的标签,对于返乡就业犹豫不决。

从大学生猪倌的叙述与行动中,可以发现他们在城市和家乡都曾试图做出努力与尝试,不断寻找归宿。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就业需求,既不能在城市得到满足,也难以在自己的家乡实现。可见,他们处于家乡与城市生活、就业的双重脱嵌状态。面对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就业环境,也无法在家乡安心生活、就业的处境,农村大学生发现“活下去”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这源于个体力量难以改变的深层次城乡社会结构性因素。农村大学生只能努力在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成为猪倌是他们在自我适应当下的城乡生活、就业现状后的选择。

2.产业振兴的拉力: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吸引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出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趋势,其中,生猪养殖业的数智化转型进度遥遥领先。根据首次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工作结果可知,无论在农业生产还是农业管理方面,畜牧业的数字化水平都遥遥领先。《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生猪信息化率以36.9%位列第一。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3—2023年,我国猪肉的消费量占主要畜产品消费量的比例超过50%,猪肉作为我国国民第一大消费肉类,规模化生产是大势所趋。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和数智化效应,不仅表现在生产效益上,还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吸纳能力上。随着猪企规模的扩大和数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引进了多种智能设备,比如环控系统、温控系统、智能饲喂等设备,实现了数智化养殖。猪企不仅需要大量劳动者,而且对劳动者的技能、学历需求也逐渐提升,这为农村大学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同时,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地域性差异也推动了农村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流动。山东省作为生猪产销大省,凭借庞大的养殖规模、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完善的设备设施,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成为吸引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磁极。受访者F5毕业于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2021年11月被招聘到大道养殖公司实习，转正后一直留在大道养殖公司。“四川工资没有山东高，养殖场设备也没有山东设备好。这边既挣得多又轻松，食宿福利也比较好。”（F5）可见，生猪养殖业现代化转型存在区域化差异，地域性的产业优势成为吸引农村大学生奔赴他乡投身生猪养殖业的重要拉力。

农村大学生在结构性推拉作用下选择在他乡从事生猪养殖业。一方面，城市的高生活成本、高强度工作以及不适应感，使他们难以完全融入城市，而乡村就业岗位有限、基础设施落后及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又使他们陷入“回不去的乡”的困境。“融不进的城，回不去的乡”构成农村大学生处于城市就业和返乡就业的城乡结构性困境，形成去他乡就业的推力。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出现现代化转型的趋势，特别是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数智化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为农村大学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另外，生猪养殖业存在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产业优势成为部分地区吸引农村大学生进入他乡就业的重要拉力。因此，农村大学生在城乡脱嵌的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拉力的双重作用下，选择去他乡成为猪倌。

（二）家庭期待与支持的鸿沟：较高的职业期待，有限的职业支持

1. 高期待的职业发展

学历是农村大学生的“新长衫”，象征进步、城市、知识、文化等现代化元素，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获得了“新长衫”，被原生家庭赋予了高学历、好工作、高工资的光环。“家里人为了我上学花了很多钱，他们觉得我上了大学，有学历，以后肯定能坐办公室、能挣大钱。父母都盼着我快毕业，努力工作，孝敬他们。”（F6）家人对农村大学生的职业期待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和就业压力。“父母也常说，为了供我上学，花了不少钱，甚至欠下了不少债。我其实也挺自责的，想要找一个又体面又能挣钱的工作，但是我能力有限，在体面与生存之间，还是要先生存。”（F7）

家庭对农村大学生的高期望无形中加剧了其“大学生身份”的紧张感。一方面，在传统农村家庭的认知中，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不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家族的荣耀，期待他们在城市中谋得体面职位。另一方面，农村家庭以全家之力支持子女上学，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获得高薪，改善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种期望转化为强烈的压力，迫使农村大学生成为穿着“长衫”艰难寻求生计的“打工人”。从农村子弟的视角看，他们内心同样渴望拥有一份既体面又高薪的工作，以此回报父母、为家人争光。但是，迫于“生存第一”的压力，他们只能在家人看不到的地方放下体面，从事生猪养殖业。

2. 帮不上的职业支持

部分农村子弟在求职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家庭社会资本。相较于城市大学生，农村大学生的家庭往往无法提供广泛的社交网络、行业内部信息等社会资源。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使他们在求职市场上“比不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求职者。2019—2022年毕业的农村大学生的感受最为明显。“那段时间真的太难了,都在家里封着,后来可以回学校了,没多久又开始封校,根本没有机会出去找工作。城里的同学相对好一点,在家上网课期间还能在城里找工作。我在农村老家,都进不了城。而且他们的父母认识的人多,一毕业就给他们安排好工作了,甚至都不用自己找工作,真的是比不了。”(F8)

根据受访者F8的表述,可以发现农村子弟与城市学生相比缺少在地求职的便利性。尤其当遭遇新冠疫情等不可抗事件时,相较于城市大学生,农村子弟缺少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找工作时频频受阻。另外,即便有机会在城市找到工作,农村大学生也会发现这些工作“一眼可以望到头”。原生家庭难以提供职业支持,这意味着农村大学生在求职中个体压力较大,他们只能依靠自己进行择业,遭遇了择业困境和职业发展困境。

可见,农村大学生举全家之力才有机会走出乡村,踏入高等教育的门槛。家人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但受限于家庭社会资本,往往无法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职业支持。从农村大学生的视角来看,家庭的高职业期待与有限的职业支持对其职业选择产生了双重压力,使他们不仅要依靠个人进行择业,更要背负养家糊口、回馈亲情的重大责任。这不仅关乎个人生存,更关系家庭的生计与发展。面临双重压力下,在追求体面职业与确保基本生存之间,农村大学生将生存视为基础,选择从事生猪养殖业。

(三)个体性经济需求:挣得多,存得下

1. 猪场工资高,挣得多

对经济资本的渴望促使农村大学生进入高收入的生猪养殖业。根据猎聘薪资待遇统计,养猪技术员的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为8262元。在大道养殖公司调研时,因为涉及工资保密原则,猪倌们一般会以整个行业的工资或者用其他等价物描述他们的收入水平。

“我们猪场的工资特别高,绩效很重要。像新冠疫情这三年,其实很多企业倒闭了,唯独猪场的工资是比较稳定的。普通技术员拿的工资也很高,我们另一位场长就是刚从技术员升上来的,他现在开的是宝马7系。其实之前在猪场工作的工资是非常高的,因为当时的猪价比较高。现在的工资只接近四年前的水平,大概也就七八千元。而且我们公司工资也是按时发放的,一般15号12点之前就到账了。”(F9)

“我上一份工作是执行兽医,月收入是一万多元,主要给猪治疗、打针,工作一点也不累。这个工作是按照打针的数量来计算工资的。一个月只有十几天要干活,其他时候都是休息,但是只能在场内休息,因为要随时准备工作,出场后再经过隔离进场太费时间了。养猪听上去不体面,但是挣钱还是很多的。我同事自己养了一批猪,4个月的育肥,拿了21万元。”(F10)

可见,养殖技术员是一个努力干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高额收入的工作,其薪酬结构中个人绩效占比较大,意味着个人努力与薪资水平直接关联。对于刚毕业、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缺少人脉、找工作难及经济紧张的农村大学生而言，成为猪倌是靠自己能够找到的在短期内进行资本积累的捷径。农村大学生选择进入猪场工作映射了个体在快速转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以个体力量寻找能够满足个体需求的职业探索，展现了个体积极发挥主体性抓住时代发展潮流的个体行动。

2. 封场消费低，存得下

由于生猪具有易感染病毒的活体特性，猪场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采取了封场生产、集中休假的制度。一方面，封闭生产管理要求员工工作、生活都在猪场内部，企业为员工提供食宿；另一方面，集中休假制度是一个月连续休假四天或两个月连续休假八天。甚至，为了节约成本，大道养殖场设置了每天200元的封场费鼓励员工放弃每月四天的集中休假。即猪场承担了猪倌的食宿消费，甚至为了使猪倌长期驻场劳动，愿意额外支付封场费。

被访者都表示猪场消费低，可以存下钱。“我有同学在上海做宠物医生，工资一万元左右，但是除去吃住成本，基本也剩不了多少。在猪场主要是能攒住钱，如果在猪场内挣5000元，相当于在外面挣6000元以上。而且在猪舍干活的时候也带不进去烟，抽烟都变少了，消费都低了。”（F4）“一般都是小情侣一起来，主要是花不到自己的钱，钱都留在手里，这个工资在外面可挣不来。而且在外面七八千元工资的工作不太好找。这边至少管吃管住，能够攒钱，因为在猪场有钱也没地方花。存钱多好！我挣钱我不花。钱拿在手里比较有安全感，我想干啥就干啥。”（F11）

大学生猪倌不仅要求能赚到钱，也越来越关注和期望存得下钱，即他们不仅关注当下的经济资本，也关注可持续、可积累的经济资本。由于养殖场生活环境通常较为封闭，生活费用较低，员工不需要支付高额的住房、交通或其他生活成本。因此，在工资性收入相似的条件下，进入猪场工作意味着更高的储蓄潜力，这种潜在的经济效益提升了猪场就业的吸引力。对农村大学生猪倌而言，相对于当下物质消费的追求，他们更看重积累储蓄、未来投资等长远目标，这与猪场的低消费和高储蓄潜能相契合。

猪倌工作“挣得多，存得下”的特点与农村大学生的经济需求相契合，是农村大学生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一方面，生猪养殖业工资高，挣得多；另一方面，生猪养殖业封场生产，且包食宿，消费低，可以存得下钱。

（四）“生存文化”的建构

农村大学生做出“成为猪倌”的职业选择受到“结构—家庭—个体”视角下综合因素的影响。首先，大学生猪倌受到结构性推拉作用的影响，面对“融不了的城，回不去的乡”的城乡结构性困境，将他乡就业作为选择。同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生猪养殖业规模化和数智化发展迅速，成为吸引农村大学生的产业结构性拉力。其次，家人有限的职业支持意味着农村大学生要靠自己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流动，同时要满足家人对其体面工作与高薪工作的期待。在权衡个人能力和生存需求后，农村大学生选择了靠个人能力可以找到的、优先满足家人高薪期待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猪倌岗位。最后,在经济需求导向下,农村大学生发现猪场可以提供较高的薪资,并且封场管理,提供食宿,日常开支低,短期内可以有效积累财富。于是,他们在家里人看不到的他乡脱下“长衫”,进入具有经济优势的养猪产业。猪倌可以视为一种农村大学生在洞察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平衡家人的职业期待和职业支持以及个体的生存现状后,做出的满足生存需求目标的职业选择。

成为猪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更是一种“生存文化”的建构。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提出,工人子弟在不被学校正式的教育体系认同的情况下,通过自我洞察发展了“反学校文化”。不同于工人子弟在学校表现出的“反学校文化”,农村大学生按部就班完成了高等教育,但是在职业选择时,遭遇了主流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困境,创造了与工人子弟的“反学校文化”类似的“生存文化”。这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背景、个人需求下所洞察发展出来的独特文化。“生存文化”以生存为核心,展现了农村大学生在综合考虑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家庭责任和经济需求等多重因素后,选择了“挣得多,存得下”的猪倌工作的自我洞察和职业选择的过程。

“生存文化”的核心意义在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经济独立,特别是在城乡结构性差异和社会流动受限的背景下,“生存文化”是农村大学生在有限的社会流动中的创造性实践路径和主体性选择。正如威利斯的“反学校文化”中工人子弟对教育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一样,农村大学生猪倌的“生存文化”也是对传统就业路径的反叛。但大学生猪倌的“生存文化”中除了抗争外,同时也具有积极的适应性,是面对当下的结构性困境和流动性困境所做出的妥协式文化建构。

五、两难困境:在自我认同与自我怀疑中徘徊

在“生存文化”主导下选择成为猪倌的农村大学生实现自我认同了吗?实际上,农村大学生进入猪场工作后,陷入了两难困境,他们在自我认同与自我怀疑中徘徊。大学生猪倌的叙事中反复出现“猪倌—大学生—家人”三个身份,这分别代表了其在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职业身份、学历身份和情感身份,他们在这三种身份中不断斗争、分裂,积极探索自洽的生存状态,寻找自我认同。

(一)职业身份:“吃饭的家伙”与“臭养猪的”

养殖技术员是大学生猪倌的官方职业名称,是一种职业身份,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吃饭的家伙”。技术员是猪场为吸引大学生入职所做出的岗位名称调整,除此之外,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岗位名称都做出了调整,例如车间主任、场长。其中,技术员是猪场最基层的猪倌,其工作职责与传统饲养员相似,主要负责猪只喂养和卫生维护。然而,他们的劳动方式不同,技术员通过操控机器完成生产任务,不同于传统猪场中依靠体力劳动进行生产的饲养员。技术员所蕴含的职业意义比饲养员更为丰富,更贴合大学生群体所具备的技术知识背景。大学生猪倌更认可技术员的称呼,并通过阐述自己与传统饲养员之间的区别,强调自己并非普通的饲养员。“饲养员是在传统猪场养猪的,我们是在智能化猪场劳动,是懂设备、懂技术的。”(F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大学生猪倌自豪于能够在岗位上通过个人努力谋生并赚取丰厚的薪酬。然而，他们也常常陷入对职业身份的自我怀疑中。一方面，尽管他们在远离家人、老乡、亲戚、朋友的乡村脱下了“长衫”，但是他们仍然不愿向朋友和家人提及自己的职业，尤其是与猪场相关的工作细节。“回家后，他们不问我做什么工作，我是不会主动说的。要是他们问起来，我会说技术员，也不会特意说明自己是在猪场工作。如果他们继续追问，就说一下自己的工资，他们一听工资也就不会再深问了。如果他们知道我去养猪了，肯定会说‘这书念的是什么，最后养猪去了’。技术员说得好听，说白了就是一个养猪的！”（F4）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这个行业的可持续性。“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我现在21岁，等我26、27岁结婚后，我不可能一直在场里面待着。如果结婚了，不可能两三个月回去和妻子见一面，我认为这样不合适。再往远说，当父母五六十岁了，应该尽孝了，不可能不回去，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生子。总之，还是不方便。”（F3）

可见，农村大学生一方面认同“猪倌”这一职业身份，并将其视为获取经济资本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们对从事生猪养殖业可能遭遇的社会偏见心存忧虑，同时对职业发展及其可持续性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二）学历身份：“往上走的通行证”与“走下高台”

学历不仅决定了员工的基本工资，更是向上职业流动的通行证。大道养猪场根据学历划定岗位基本工资，比如，本科学历的猪倌基本工资会比专科学历的猪倌高1000元。“当时念了一年高职，就辍学不念了，现在感觉学历很重要。我不理解明明是干一样的活，他学历比我高，拿的就比我多。而且不管我怎么干，我都只能是技术员，不可能成为车间主任，学历上达不到。”（F12）可见，学历影响的不仅是猪倌当下的基本收入，更重要的是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对于有计划在养殖行业深耕的大学生而言，他们会主动提升学历、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我进猪场，肯定不想一辈子都只是‘技术员’，我还是想往上走。我今年已经考出执业兽医资格证了，我还要继续考研。学历越高，工资越高，才能发展得更远。”（F13）

然而，当农村大学生离开校园时，他们很快意识到学历不是万能的。一方面，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普遍期待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能够从事“白领”工作，这往往与舒适的办公室环境、较高的社会地位等相关联。当从事与学历看似不匹配的养猪等“蓝领”工作时，他们感受到社会期望与实际选择之间的冲突，从而引发了自我认同的矛盾。“我发现学历限制了好多人的思想。如果没有上大学的话，我可以去服务业，可以去做销售、卖奶茶。但是我上大学了，如果再去干这些工作，有人就会觉得你父母供你上大学，是让你干服务员吗？”（F14）另一方面，进入猪场之后，他们发现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并不总是具有实用性。即便是动物医学、动物科学等专业的大学生，在实际操作时也需要重新学习。可见，拥有专业学位并不意味着拥有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比如，大道养殖场的四线配怀车间主任F15本科学的是机械专业，在大学期间并没有进行相关专业的学习，反而在实践中通过学习探索，成为配怀车间的能手，甚至管理着拥有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背景的技术员。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大学生猪倌在学历身份上也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学历为他们提供了升职、加薪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陷入学历困境,包括学历与职业的冲突、所学知识与实践操作的不匹配等。然而,大学生猪倌并没有陶醉于学历所带来的光环,而是走下"学历的高台",跨越传统界限,从基层做起,通过实际操作经验的积累,获得了更加开放和多样化的职业发展空间。

(三)情感身份:"为了家人"与"得不到认可"

大学生猪倌常常把"家人"挂在嘴边。他们多具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感,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支持家庭,例如隐藏自己的欲望、牺牲自己的追求,包括原有的职业规划、猪场工作对自由活动的限制等。"一开始干这个的时候,我也很犹豫。但是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一开始学这行是为了什么?干这行是为了什么?当初学这行,我就是想要在社会上生存,干这行就是为了能挣到钱,可以让自己吃得饱、穿得暖、有钱花。人活着就是为了把该孝敬的人孝敬了,把该养大的人养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是人的目标……我们场里也有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同事,都是为了养家糊口。"(F16)可见,农村大学生选择进入高薪的养殖业,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资本积累,更多的是为了整个家庭的资本积累,他们对家庭负有极高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即便大学生猪倌为家人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是他仍可能得不到认可。一方面,猪倌在当下的社会认知中并不是一个体面的职业,与家人的预期不符,可能会遭遇抱怨和不理解,比如"你上了大学,上了研究生,最后就干了个养猪的"。同时,农村家庭也更期望子女可以早日成家,但是封场劳动生产限制了猪倌谈恋爱的机会,使猪倌面临家庭再生产的难题。另一方面,社会对养殖行业的刻板印象使猪倌并不能得到社会认可,甚至可能会连累家人。"如果你说自己是养猪的,社会上的人就会有一种很排斥、很鄙视的眼神。但是他们干三年也比不上我们干一年的工资。当时家里给我介绍的对象是幼儿园的生活老师,她一个月2800元,问我工资多少,我说我是你的10倍。但是她根本看不上我,在她的印象里,猪倌还是传统的又脏又臭的形象。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我结婚之后,有老婆、小孩了,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工作让家人也抬不起头吧。"(F9)

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多具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感,愿意牺牲个人利益而支持家庭整体的发展。但是即便做出个人牺牲,大学生猪倌的职业选择也很难得到家人、社会的认同。虽然大学生猪倌获得了经济上的满足,但是在社会支持、社会认可等方面却遭遇了困境。

(四)成为猪倌:生存诉求与身份困境

综上所述,无论职业身份、学历身份还是情感身份,猪倌的职业体验并没有让农村大学生获得全面的自我认同。他们获得的是可观的短期经济效益和职业发展路径,并没有完全实现自我认同,也没有获得外界的认可。可见,大学生猪倌的经济地位较父辈有所提升,但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实际上，大学生猪倌在不同身份之间也存在张力。首先，在职业身份与学历身份中，“猪倌”与“大学生”是两个看起来平行的身份，却意外联结在一起，这冲击了传统社会的认知，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其次，在学历身份与情感身份之间，大学生猪倌也很难权衡和实现平衡。一方面，如果一直穿着“长衫”在城市“勉强”工作，可能难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甚至还需要家庭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脱下“长衫”回到农村生活工作，又可能受到家庭的不理解与抱怨。最后，职业身份与情感身份之间很难获得平衡，究其根本是猪倌的职业身份很难得到亲戚朋友的认可和支持。

可见，不管是在单一身份中还是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农村大学生猪倌都难以实现全面的自我认同，他们不断在自我认同与自我怀疑中摇摆，尝试寻觅一个平衡点。基于“生存文化”的现实，他们选择成为猪倌，即便遭遇了身份困境，但迫于生存压力，他们欣然接受了当下的处境，选择从事生猪养殖业。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大学生不同于威利斯笔下作为工人阶级子弟的“家伙们”，他们并没有出现“反学校文化”，而是按部就班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教育，但最终还是从事了父辈赖以生存的第一产业。从农村大学生的行动可以发现，他们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即“生存文化”。面对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推拉作用，家庭对其职业发展的期待与职业支持的鸿沟，以及个体的经济需求等“结构—家庭—个体”多方制约，使“生存”成为其职业选择的第一要义。作为能动者的农村大学生并不是全然被动，而是积极发挥主体性，选择“挣得多，存得下”的猪倌工作。大学生猪倌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能动者，以“生存”为第一目标，努力在所处社会的“意义创造”中权衡自己的生存处境，包括经济地位、个人发展、自我尊严、社会关系等，尝试寻找合适的位置。然而，从事养殖工作后，他们虽然在经济收入及职业发展上获得了一定的自我认同，但在职业身份、学历身份和情感身份中并没有获得全面的自我认同，在可持续发展、自我尊严、社会认可等方面陷入了困境。

虽然大学生猪倌抓住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机遇，进入现代农业行列，但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还处于发展初期，仍存在很多挑战，猪倌的职业前景尚不明晰。同时，由于猪场封闭工作，猪倌的结婚生子、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一系列再生产受限，使得大学生将猪倌工作视为在短期内快速赚钱的机会，而非长期的职业选择。最后，猪倌与大学生是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融合，生猪养殖被视为一种传统行业，与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形象契合度低，社会认可度低，容易使大学生猪倌陷入认同危机。

大学生猪倌现象背后是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更宏观的是社会稳定、社会再生产及现代化转型的议题。农村家庭往往并不富裕，他们为子女教育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将家庭的发展寄托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身上。就此而言，农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一人就业，全家温饱”的社会稳定问题。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高质量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展的关键时期，农村大学生就业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要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首先，政府、市场、企业等主体应该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例如，政府通过人才服务中心为农村大学生提供就业咨询、岗位推荐，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村大学生可以采取精准帮扶的措施；市场和企业也应该积极为农村大学生提供岗位支持。其次，政府应该做好基础性社会保障服务，特别是在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再生产方面，帮助农村大学生解决家庭再生产难题。再次，政府和学校应该加强宣传传统行业在转型期发生的新变化，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最后，农村大学生应该加强自身的能力水平和职业素养，设置合理的职业预期，增加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布尔迪厄，皮埃尔、帕斯隆，J. C.，2002a，《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b，《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程猛、康永久，2016，《“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4期。

胡勇，2018，《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代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成长史》，《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吉登斯，安东尼，1998，《现代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军宁、王焱，1998，《自由与社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吕鹏，2006，《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社会学研究》第2期。

马克思，197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帕特南，罗伯特，2017，《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孙晓雨、王小璐，2023，《寒门学子如何就业？——基于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资本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业教育》第2期。

王胜威，2023，《阶层流动“内卷化”视角下的“小镇做题家”》，《理论观察》第11期。

王旭清，2021，《寒门温室：城镇化中农家子弟教育的家庭参与机制》，《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王郢、宋洲，2024，《“寒门”能否出“贵子”——试论教育在阶层流动中的作用及其研究转向》，《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威利斯，保罗，201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谢倩芸，2023，《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许多多，2017，《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社会》第4期。

应中元，2020，《“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困境与逆袭之路》，《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余秀兰，2014，《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高等教育研究》第7期。

张人杰，2009，《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文喜，2000，《马克思的自我认同观与现时代》，《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

郑雅君，2021，《“90后”名校大学生工作意义的构建——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探究》，《青年研究》第3期。

周勇，2017，《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历史社会学视角》，《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版)》第4期。
朱国华,2015,《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朱焱龙,2018,《“资本补给”与“自觉共情”:低阶层子代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过程的代际支持》,《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Bowles, S., & Ginti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Survive First: How is College Graduate Swineherd Possible?

WANG Hui WEI Luxing WU Huifang

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after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the college graduate swineherd at the Dadao Farm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why rural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still engage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that their parents relied on for survival and whether they can achieve self-identity. The study returns to the subject itself along the two paths of reproduction and identity, and seeks the answer from the insights and cognition of the college graduate swineher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llege graduate swineherd choose to become pig herder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that “survival comes first”.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insight of college graduate swineherd, it is found that their choice to engage in pig farming is influenced by the "surviv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family-individual”.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cognition of college graduate swineherd,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riple identity of “occupation-education-emotion” is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doubt. Even in the identity dilemma, they still choose to “become swineherd”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rvival. The phenomenon of swineherd in rural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ssue concerning the employment flow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social stability,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Employment; Survival Culture; Self-identity

责任编辑:何 芳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